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工作报告

朱 英 所长

本所在入选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之后，按照《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管理办法》的规定，依托教育部、学校及相关部门的支持，通过近三年的建设，无论是科研工作，还是学术交流、人才培养以及资料信息建设、咨询服务等各方面均取得长足进步，科研管理体制也逐步成熟与完善，科研条件进一步得到改善。下面向各位专家学者和社政司领导作简要汇报。

一、科研方面，不断拓宽研究视野，积极争取科研项目，强化研究深度和力度，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绩。

科学研究是衡量一个重点研究基地乃至一个学科学术水平高低的最重要因素。因此，在近三年重点研究基地的建设中，我们始终将科学研究列为头等重要的工作，力争再上新的台阶。

1. 承担各类科研项目明显增多。

由于华中师大未进入国家“211工程”，本所的中国近现代史学科作为历史比较悠久的国家级重点学科，既不能申报研究经费相当可观的“211工程”重点科研项目，也不能申报教育部博士点基金项目，但我们在这种不利的客观环境下，通过采取种种激励措施，整合研究力量，促使研究人员积极申报其他各类课题，仍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近三年来，本所专兼职研究人员承担的各类课题多达25项，其中纵向课题包括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7项（2004年又新批准2项），教育部社科基金规划项目（包括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5项。同时还向其他部委积极申请科研项目，获批准3项。其中信息产业部批准其下属研究所委托的项目“近现代中国对外贸易与信息产业发展”，科研经费为35万元。国家清史工程启动之后，本所也组织研究人员积极申报相关项目，现已有“辛亥革命资料新编”、“苏州商团档案汇编”两个文献整理项目初步获批准，另正在申报其他三个文献整理项目和相关研究项目。

除申报纵向课题之外，本所还鼓励研究人员主动走出书斋，面向社会多渠道积极争取各种横向课题，从而改变了以往横向课题较少的状况，使本所科研课题的来源更为广泛和多元化。尤其是围绕着基地第一批重大项目“近代同业公会研究与当代中国行业规范”的研究进展，经过主动积极的争取，又获得了武汉市政府委托项目“中国现代商会研究”、中央统战部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招标

课题“新形势下我国行业协会和同业公会研究”、武汉市政府和餐饮业协会委托项目“武汉餐饮业协会建设与发展研究”等。另外，本所多年来也一直积极争取国际合作项目，现承担有国际合作项目1项。

包括各类纵向和横向课题在内，本所近三年的项目经费总额已达到320万元，专职研究人员每年人均26.2万元，兼职研究人员每年人均也达到17万元。这在本所多年的发展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重大突破。

2. 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进展顺利。

本所作为第二批重点研究基地之一，现承担有6个重大项目。根据教育部的有关规定，本所对重大项目的研究工作进行了严格管理，现均进展顺利，并已取得一系列研究成果。

“辛亥革命与中国政治发展”项目2000年立项，研究工作也已完成，等待鉴定结项。中期成果出版了《中国内地及港台地区辛亥革命史论文目录汇编》，并在《近代史研究》、《天津社会科学》、《江汉论坛》等刊物上公开发表了16篇论文（另有2篇收到用稿通知）。最终成果《辛亥革命与中国政治发展》已经完稿，并与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合同，俟鉴定通过之后即可公开出版。与此同时，本所主要专职研究人员在近三年还出版了“辛亥革命研究系列丛书”，共计5本，另外承担的与该重大项目紧密相关的“辛亥革命资料新编”（共计8册，400万字）的编纂工作，目前也进展顺利，预计2004年底全部出版。

“近代同业公会研究与当代中国行业规范”项目2000年立项，全部研究工作已经完成，正在申请鉴定结项。该项目的研究成果，包括已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的14篇论文（另有4篇收到采稿通知），3篇咨询报告，已经上报国家统战部、港澳台事务办公室等部门，2部学术专著，其中《行会制度的近代命运》由人民出版社2003年3月出版，最终成果《中国近代同业公会与当代行业协会》也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合同，俟鉴定通过之后即可公开出版。

“近代中国民间社团研究”项目2001年立项，课题组成员依据各自承担的子课题研究内容，已分赴上海、北京、南京、天津等地搜集各方面的档案文献，同时，还广泛查阅了民国时期各类报刊杂志、各类团体刊物中所包含的相关史料。目前，已取得了一部分研究成果，包括公开发表论文10篇，已完成书稿2部。

“近现代长江流域学术文化研究”项目2002年立项，资料搜集工作基本结束，并取得部分阶段性成果，撰写了7篇论文，其中3篇已公开发表，另有4篇收到杂志社用稿通知，将于下半年发表。

“近代中国学术流派研究”项目2003年立项，课题组成员利用出国、出境访问和开会机会，广泛搜集了相关资料，并多次举办小型专题研讨班，现已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发表3篇论文，另有数篇论文待发表。

“宗教与近代中国文化变迁”项目2003年立项，课题组成员已赴港台和内地搜集了大量资料，并进行了学术调研和实地考察，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也较为突出，出版了《近代中国佛教与基督宗教的相遇》一书，发表论文11篇。

3. 科研成果更为突出。

通过建立新的科研体制以及实施一系列新的奖励举措，本研究基地近三年在原有基础上取得了更为丰硕的科研成果。据统计，在这三年中本所专职研究人员出版各类著作多达22部，人均2.4部；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海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128篇，人均发表论文数多达14.2篇。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本所享誉国内外史学界的名誉所长章开沅先生，尽管年事已高，但却不仅直接指导和引领本研究基地学科建设的发展，而且自己个人的研究工作也从未间断，并不断开拓新领域，研究新课题，近三年即出版著作5部，主编著作4部，发表论文17篇，这在国内外史学界都是十分少见的。

这些新的科研成果，对于进一步强化本所的研究特色与优势，拓展相关研究领域和加强研究深度，都具有重要意义。例如著作中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辛亥革命研究系列丛书”，体现了本所在辛亥革命史这一传统优势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使辛亥革命史的研究更为深入细致。该系列著作包括：章开沅、田彤著《张謇与近代社会》、马敏著《商人精神的嬗变——中国近代商人观念研究》、朱英主编《辛亥革命与中国近代社会变迁》、严昌洪、许小青著《癸卯年万岁——1903年的革命思潮与革命运动》、罗福惠著《辛亥时期的精英文化研究》。除此之外，本所在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史这一特色研究领域中也取得了新的重要成果，包括朱英著《近代中国商人与社会》，彭南生著《中间经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中国近代手工业（1840—1936）》和《行会制度的近代命运》等著作，由此进一步拓展了本所在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史领域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4. 科研成果学术含量较高，多次荣获省部级奖励。

本所研究人员出版的著作和发表的论文，不仅数量较多，而且大多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例如仅在这三年当中，本所专职研究人员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海内外有影响的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达到15篇。出版的著作被CSSCI引用次数为142次，论文被CSSCI引用次数为83次，人均著作和论文被CSSCI引用次数为25次。

正因为如此，本所专职研究人员的科研成果在近三年中11次荣获省部级优秀成果奖励。其中《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专著）获教育部第三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专著）获教育部第三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辛亥前后史事论丛续编》（专著）、《中国鼓文化研究》（专著）、《湖北通史》（专著）均荣获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过渡形态：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谜》（专著）获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另有多项成果获得三等奖，同时还有一项成果获中国图书奖。

二、人才培养方面，通过科学研究重点培养青年学术骨干，并采取多种措施提高研究生的理论素质与学术水平，取得显著成效。

本所中国近现代史学科于1981年首批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在章开沅先生多年的领导下，形成了学风严谨和研究氛围宽松的优良传统，不仅使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和骨干得以迅速成长，而且培养了一批基础扎实、视野开阔的博士，其中有不少人是当今国内近现代史学界相当活跃且颇有影响的中青年学者，由此在人才培养方面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在海内外近代史学界也普遍受到好评。在建设重点研究基地的过程中，本所继续发扬这一优良传统，明确思路，制定人才培养方案，积极采取一系列新举措，从而在人才培养方面也取得了新的成效。

1. 确立重点培养青年学术骨干的人才培养思路。

大约在10多年以前，本所即形成了一支结构比较合理的学术梯队。不仅有老一辈著名学术带头人坚持在科学研究和学科建设第一线，而且在各主要研究方向，50岁和40岁左右乃至更青年的研究人员中，都分别拥有几名在近代史学界享有一定知名度的学术带头人和骨干，其不断取得的许多研究成果都受到重视与好评，这也是本所能够在国内外近代史学界奠定学术地位和影响的重要因素。随着时间的流逝，原有学术带头人和骨干的年龄不断增高。于是，培养更青年的学术骨干，成为目前本所尤为重要的任务。因为青年学术骨干能不能迅速成长，并在不久的将来脱颖而出，关系到本所学术队伍是否后继有人，也直接影响本所学科建设能否持续发展，所以近年来我们一直将培养30岁左右的青年学术骨干，作为本所人才培养方案中的首要重点。

2. 实施新的科研管理体制，为青年学术骨干的成长创造条件。

教育部建设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以及强调在基地科研管理方面进行改革的举措，包括基地重大项目的实施，为本所培养青年学术骨干提供了良好的机遇。通过实行聘任制，一部分基础扎实、研究能力较强的青年研究人员，成为重大项目的课题组成员，不仅在研究基地的内部分配方面享受倾斜政策的待遇，而且拥有较为充裕的科研经费，在其他方面基地也相应提供一些条件。当然，进入研究基地的青年研究人员，必须严格履行聘任合同中规定的义务，这在促使其专心从事科学研究的

过程中是一种很大的动力，并非完全是一种简单的约束。

通过实施新的科研管理机制和相关激励措施，本所在培养青年学术骨干方面已初见成效。曾荣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励的彭南生博士，参与了首批重大项目“近代同业公会研究与当代中国行业规范”的研究工作，取得了突出的科研成果，已出版学术著作2部，发表论文多篇，其系列论文获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并独自承担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现已被学校评聘为博士生导师。

另一位青年研究人员郑成林博士，参与了基地两个重大项目的研究工作，也取得了比较突出的阶段性科研成果，已在《近代史研究》、《天津社会科学》等CSSCI收录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了6篇论文。2001年中国史学会主办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全国组织15位著名专家、学者对众多应征论文进行严格评审，郑成林成为全部入选论文作者中最青年的一位，受到好评。同年10月，郑成林又应邀赴台湾出席学术研讨会。

刘家峰博士是作为带课题进入基地的青年研究人员，由于他专心治学，踏实勤奋，在科研方面进步迅速，2001年申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获批准立项，2003年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又获批准立项，今年申请的一项国际合作项目也初步获得批准，现已被学校破格评聘为副教授。

3. 采取各种措施提高研究生的理论与学术水平，培养更多的高素质专门研究人才。

培养高水平的研究生是本所多年来的传统，在近三年的重点研究基地建设过程中，这一传统继续得到发扬光大。三年期间，本所毕业的博士、硕士生29人，目前在读的博士生30名，硕士生也为数不少。为了提高研究生的理论与学术水平，除继续施行过去行之有效的各种方法外，近年来又采取了一些新的举措。

(1) 吸收优秀的研究生参与重大项目的研究工作。本所第一、二批重大项目的课题组成员中，都有优秀博士生承担子课题的研究任务。他们与导师共同搜集资料和从事研究，科研能力在实践中得到显著提高，不仅能够顺利完成课题任务，而且取得了比较突出的阶段性成果，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研究领域。例如许小青参加《辛亥革命与中国政治发展》项目的研究，在撰写的书稿中提出了一些富有独创性的见解，并在《天津社会科学》、《浙江学刊》等刊物上发表论10余篇。魏文亨在《近代史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近10篇，另还有一篇与导师合作撰写的论文即将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付海晏也在《二十一世纪》、《开放时代》等学术刊物上发表7篇论文，付海晏于年初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已获批准立项。

(2) 不定期主办研究生论文发表会。开展此项活动的目的，一是推动研究生从事学术研究，撰写专题论文，在实践中增强科研能力；二是提供一个较为正式的学术场所，帮助研究生提高评论学术论文和口头表达能力。其具体操作方法是，完全按照正规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模式，由指导老师担任会议主持人，在规定的时间内由研究生宣读论文和进行评论，然后提问和进行自由讨论，最后由报告人答辩回应，主持人进行点评。通过这种锻炼，研究生的综合素质和学术水平普遍有明显提高。在2003年举办的以研究生为主的第四届海峡两岸三地历史学青年学者论文发表会上，本所研究生无论是提交论文的学术水平，还是在会上的评论和讨论发言，都表现非常突出，受到与会港台学者的一致称赞。

(3) 定期举办研究生读书会。此项活动是在研究基地的统一部署之下，由研究生学术活动小组组织进行，一般每隔2周举办一次。每次读书会讨论一部有影响的学术著作，事先安排1-2名研究生作导论和主题发言，然后自由提问和讨论。通过这样的读书会，使研究生能够及时了解学界最新研究成果，掌握学术研究的发展动向，并促使研究生在读书的过程中勤于思考。

(4) 开设网上“学术论坛”。为了给研究生的学术交流和讨论提供更加及时和方便的场所，在重点研究基地的网站上开设了“学术论坛”，所内外的学者与研究生均可借此平台，交流学术信息，自由讨论学术问题。

(5) 设立基金资助或奖励研究生开展学术研究。本所用日本著名学者野泽丰教授捐助的资金，设立了“野泽丰学术奖励基金”，每年在研究生发表的论文中，评选出一、二、三等奖若干名，分别奖励三千、二千、一千元。另还设有“余家菊学术奖学金”，为研究生申报的科研项目提供二至三千元研究经费。

通过采取以上一系列措施，本所在培养高素质研究生方面所取得的成效十分显著，不仅受到研究生的普遍欢迎，而且得到国内外史学界的称赞。

三、学术交流更加广泛，学术影响日益扩大。

章开沅先生是我国改革开放之后最早出访欧美和亚洲许多国家的历史学家之一，因而早在20世纪80年代，本所即开始在国内建立了较为广泛的学术交流关系。在近三年重点研究基地的建设过程中，本所又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在海内外的学术交流。

1. 主办学术研讨会加强学术交流。

在三年内，本所共主办了五次重要的学术研讨会，即“基督教来华与中西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海峡两岸四地辛亥革命学术研讨会”、“近代档案与城市发展学术研讨会”、“中国江南市

镇国际学术研讨会”、“两岸三地历史学青年学者论文发表会”。另外还与韩国延世大学统一研究院联合举办了一次小型学术讨论会。这些会议的召开不仅推进了学术研究的发展，促进了国内外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还扩大了本所在香港、台湾以及国际上的学术影响力。

2. 设立专门基金提高学术交流的层次。

2001年底，在海内外学者和学校各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成立了“章开沅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中心”和“章开沅东西方文化交流基金”。这是本所在中国近现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方面的一个新起点，也是本所乃至全国在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领域开展学术交流的一个新平台。根据基金章程的规定，“章开沅东西方文化交流基金”每年邀请1-2名国外著名学者，作为“章开沅学术讲座教授”来华开展系列讲学和从事学术研究。目前，已有美国著名历史学者鲁珍晞(Jessie G. Lutz)教授、法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汉学家巴斯蒂教授(Mme. Marianne Bastid-Bruguière)、比利时皇家科学院院士著名汉学家钟鸣旦教授接受该基金的邀请，先后来我校从事系列讲学活动，产生了良好的学术影响。在条件成熟时，该基金还计划资助国外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来华从事东西方文化交流方面的专题研究。

3. 鼓励研究人员出国、出境访问讲学和出席学术研讨会。

本所一直通过各种方式，鼓励研究人员出国、出境参加学术会议，开展学术访问和学术讲座，从事科学研究。对于研究人员出席国内重要学术研讨会，更是予以大力支持。三年来，本所专职研究人员参加国内外学术活动频繁，成效显著。出席国内外各类学术会议52人次，提交论文47篇。本所多名教授对法国、日本、韩国、香港以及台湾的多次学术访问，不仅增进了与国际学术界的友谊，而且也加强了学术交流和沟通。同时，众多国内外学者来本所或讲学、或访问、或参观，进一步促进了本所的教学科研工作。据不完全统计，本所共接待国外学者来访讲学30余人次。2002年6月，本所还与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签署学术交流协议，使本所与该系在合作主办学术研讨会、教师进修和互访、研究生共同培养、图书资料互赠等方面的合作关系，进入一个新的重要阶段。

4. 积极开展两岸三地研究生的学术交流活动。

研究生是史学研究的重要后备力量，他们的顺利成长直接关系到今后中国历史学的繁荣发展。过去，绝大多数科研单位往往是注重于研究人员的学术交流，很少顾及青年的研究生。为了拓宽学术交流的范围，增进两岸三地研究生之间的情谊和相互了解，本所近三年来在这方面采取了若干措施。一是创造条件使研究生得以赴港台访问和出席学术研讨会，现已有2名在职博士生赴台湾出席学术会议，有1名博士生到香港中文大学从事学术访问和研究，同时正帮助另一名博士生申请赴台湾从事学术研究。二是积极促成两岸研究生开展联谊活动，2001年本所所长朱英教授利用在台湾讲学的机会，

主动联络，促成台湾政治大学邀请华中师大、武汉大学的15名研究生赴台湾访问10天，与台湾各主要大学的研究生开展了学术讨论和其他多种形式的联谊活动。三是积极承办两岸三地历史学研究生学术研讨会，2003年本所与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香港珠海书院亚洲研究中心成功地共同主办了以研究生为主的第四届两岸三地历史学青年学者论文发表会，讨论主题为“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与变迁”，台湾各大学的15名研究生和香港各大学的10名研究生，以及国内各高校近现代史专业的近25名研究生出席了会议，与会研究生感到在各方面都有较大的收获。

5. 创建基地网站，为国内外学术交流提供新平台。

本所创办的历史虽然较长，但过去一直未独立创建自己的网站。2000年被评审为重点研究基地之后，按照要求创建了基地网站，并有专人维护与更新。网站创办之后，不仅便于世界各国学者浏览和了解本研究基地最新发展现状，而且为学术交流提供了便捷的新平台，产生了重要的积极影响。本所计划在今后的一两年内把网站建设成为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具有较大影响力的门户网站，借助网络技术，实现学术交流的网络化。

四、强化图书资料和信息网络建设，为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和学术交流创造更好的条件。

丰富的史料是史学研究不可缺少的首要条件，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也越来越成为影响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和学术交流的重要因素。近三年来，在资料和网络建设方面本所不断加大投入，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1. 有计划购置大型图书和报刊资料，建设一流的资料信息中心。

本所建立有独立的资料室，拥有3个书库、1个阅览室、2个国内外学者赠书专藏室，另还设有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中心资料文献室，总面积约1000平方米，各种藏书十分丰富。为了将资料室建成一流的资料信息中心，本所近年来不断加大经费投入，购置各种大型图书资料和中外文期刊。三年中直接用于购置图书和期刊的经费，达到36万余元；用于复印《商务官报》、《华商联合报》、《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会报》、《商业月报》等多种近代报刊的经费，也达到近10万元，另还在国内外购置了许多近代重要文献资料的缩微胶卷。目前，本所资料室已收藏了近代中国的一些主要报刊，以及相关的大型成套资料集。

2. 创建特色资料库，为国内外学者从事相关研究提供便利。

目前，本所已初步建成两个特色资料库。一个是在美国亨利鲁斯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建成的中国基督教史文献中心，该中心所藏文献大都以缩微胶卷的形式从海外购得，共约1200余卷，前后总计

花费近10万美元。按照内容，现藏文献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基督教在华差会和传教士个人档案，包括六大公会、近百名传教士以及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所属的十三所中国教会大学的档案；另一类是与中国基督教史相关的中英文期刊，已藏有四十多种。现在，该中心已成为中国大陆收藏基督教史料最丰富的学术单位。

另一个特色资料库是中国商会研究资料中心。该资料中心通过数年的建设，采取复印和购置缩微胶卷等各种方式，现已收藏了有关近代商会、商人和商业史等方面的主要报刊资料，曾数十次接待研究相关专题的国内外学者前来查阅。

3. 利用先进技术，分阶段实现资料信息化。

本所收藏的近现代史资料已非常丰富，为适应建设重点研究基地的需要，制定了分阶段实现资料信息化的方案。目前，已建立了资料目录数据库，可通过网络进行联机检索和查询，提供非常方便的图书资料查询和检索服务。计划今后进一步利用先进技术，逐步实现能够在网上阅览资料的目标。本所现已依托校园网建立了自己的局域网络，每位研究人员的工作室都可以上网，实现了相互之间的资源共享。

五、咨询服务取得突破性进展。

历史学作为传统的人文学科，主要是从事基础性研究，在对现实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提供咨询服务方面，一直是公认的薄弱环节。过去，本所也并未有意识地主动发挥这方面的功能与作用。近年来，章开沅先生在《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访谈和论文，不断倡导“参与史学”，全体专职研究人员也积极付诸行动，使本所在咨询服务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1. 积极为“文化武汉”的建设献计献策。

章开沅先生曾专门发表《精品意识与文化武汉》（《政策》2003年第9期）一文，对“文化武汉”的建设提出了一系列精辟见解，受到武汉市政府高度重视。在“首义文化园建设方案”的论证过程中，本所以章开沅先生为首的多位教授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武汉市政府主办的专家论证会，本所4位教授出席，并由章开沅先生担任专家组组长。本所与会教授就如何弘扬首义精神，推动城市文化建设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并从整体上对首义文化园的建设规划方案提出了许多建议，尤其就如何突显首义特色和精神，如何处理好文化塑造、旅游、休闲等各方面的关系，进行了比较充分的论证。同时，还阐明辛亥首义的精神文化如何通过物质文化更好地反映出来，达到预期的目的。这是本研究基地发挥学科优势，为当前武汉社会与文化的发展献计献策，为政府部门的决策提供咨询服务的一项重要举措，受到市长李宪生、副市长涂勇等多位市领导的高度肯定。

2. 贯通历史与现实研究，积极主动地承担政府及相关部门的委托研究项目。

现实是历史的发展，相互之间常常有着某种内在逻辑联系；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也能够为现实提供有益的参考借鉴。本所近年来在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尤其是对商会、行业协会的专题研究，即坚持将历史与现实紧密结合起来进行探讨，除承担研究基地的重大项目之外，还主动承担了政府和行业协会委托的相关研究项目，包括一些招标课题。如武汉市政府委托项目“中国现代商会研究”、中央统战部中国统战理论研究会招标课题“新形势下我国行业协会和同业公会研究”、武汉市政府和餐饮业协会委托项目“武汉餐饮业协会建设与发展研究”等。目前，这些项目的调研工作均初步完成，已撰写了多份咨询报告，送交政府及相关部门，有的已得到采用回复。同时，还在一些公开和内部刊物上发表论文或访谈，就当前我国商会、行业协会的建设及功能作用的发挥等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决策建议。如朱英教授曾在北京内部刊物《改革内参》（2001年第2期）的“决策参考”专栏发表《行业协会不是“二政府”》，另在新华通讯社《湖北内参》（2002年第20期）发表《建立和完善民间中介组织尤为重要》等文。本所的中国商会研究中心还与武汉市工商联签订了长期合作研究的协议，共同开展有关商会与行业协会的调研。由于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马敏校长、朱英教授、郑成林博士等人曾多次应邀出席重庆、昆明、无锡等地召开的商会与行业协会建设研讨会，并在会上作主题演讲。

3. 发挥学科优势，就两岸学术交流提出新建议。

辛亥革命是本所传统的优势研究领域，成果显著，在海内外享有盛誉，由此与台湾近代史学界的交流也非常密切。但是，近些年来随着台湾政治局势的变化，台湾学界的近代史研究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并对两岸的史学交流产生了一定影响。如何作出应对举措，需要认真探讨。本所经过调研，向国台办、中央统战部提交了咨询报告《海峡两岸史学交流的新趋向以及应对措施》。该报告分析了两岸史学交流的新情况及其产生原因，并提出应该采取的若干措施，受到重视与好评。中央统战部表示：该报告“对海峡两岸史学交流现状的概括是真实、准确的，也是敏锐的”，对其“形成原因的分析，也是比较客观和具体的”，“提出的几项应对措施值得重视”，“对我们有的放矢加强对台宣传、交流工作有着现实的启示、咨询意义”，“在今后工作中将会进一步研究该报告的有关分析和建议，并通过适当方式向各有关部门反映”。

上述表明，作为基础学科的历史学研究基地，在坚持以基础理论研究为重点的前提下，如果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开动脑筋，也能够以各种方式为现实经济、文化与社会的发展提供咨询服务，同时也可以更加充分地发挥历史学的功能与作用。

六、科研体制改革逐步深化，研究条件不断得到改善。

本所在科研管理方面，严格遵守教育部制定的基地管理办法，不断完善和健全新的科研体制，建立开放、流动的运行机制，研究人员带（给）课题进基地，完成课题后出基地，实行合同聘任制和驻所研究制度，充分激活科研热情，努力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

为形成既竞争又合作，既分工又团结的良好工作局面，经基地学术委员会通过，本所先后制定了一系列的科研管理制度，以规范和管理本所的科研工作，其中包括管理工作条例、学术活动管理办法、项目管理条例、科研经费管理条例、科研工作量及科研成果奖励规定、图书资料仪器设备管理条例等规章制度，这些规章制度分别从行政设置、学术活动管理、项目管理、科研经费管理、科研奖励以及资料设备等方面进行了科学详细的规定。如在科研经费的管理和使用方面，由课题组编制预算，申报基地学术委员会批准后才能使用。在科研成果奖惩方面，课题完成以后，对鉴定通过的优秀成果进行奖励；对不合格的成果，追究课题承担者责任。此外，基地仪器设备、图书资料由专人负责建设和管理，并根据工作实绩对专职行政人员、资料人员给予物质和精神的奖励，打破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体现多劳多得、优劳优酬的原则。这些规定不仅使本所的日常科研管理和科研工作有章可循，而且极大地促进了本所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

近三年来，随着重点研究基地的建设，学校加大经费投入，使本所研究人员的工作环境条件也在原有基础上不断得到改善。在这三年中用于购置各式电脑、打印机、空调、复印机、传真机、数码相机、多媒体投影仪等设备的经费，以及房屋装修费共计50余万元，报告厅和会议室均装饰一新，安装了多媒体设备。现在，每位研究人员都拥有独立的工作室，并配备了电脑、空调、电话，能够比较舒适和安心地从事学术研究工作。此外，学校还为基地的驻所研究人员提供了2套三室一厅的住房，配备了全套家具、厨具、空调、电视、电脑和电话。

总结近三年来的基地建设工作的，尽管平时感到比较辛苦，但同时也为辛勤努力换来的成绩感到非常欣慰。我们深知，要真正建设一流的研究基地，取得更多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培养更多高水平的人才，在学术交流、资料建设、咨询服务和科研体制改革等各方面做得更好，还需要今后更进一步地努力。

同时，我们也知道经过三年的建设，本研究所虽然取得了不少成绩，但在许多方面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缺陷和不足，诚恳希望各位专家学者、社政司领导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谢谢。